

【文坛往事】

□刘增人

1914年,叶圣陶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卖文为生,曾在《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组文言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1918年起,开始发表批量白话小说,后来大多收入《隔膜》、《火灾》、《线下》、《城中》等集,与冰心在此前后发表的小说,被文学史家共同称为“问题小说”。也因此,叶圣陶通常被誉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之一。

抗战以来,漂泊流离,既无较为安逸的执笔的环境,更



▲叶圣陶

叶圣陶的抗战小说

以精妙的白描传神地勾勒出的小说人物,既非勇将策士,更非达官显宦,却都站在自己平凡的生活岗位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圣战中的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从容地构思故事的心境,叶圣陶几乎与小说绝缘了。但那些在艰难岁月里挺直了脊梁、谨守着节操的“义民”的精神,却一直在他心目中放着光彩,发出声响,呼唤他拿起笔来。1938年10月,他发表了入川后第一篇小说《我们的骄傲》。说是小说,不过更换了人物的姓氏,剪裁了事件的时序,其余的几乎完全是实录:四个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一路走着,一路回想当年在小学读书做黄先生的学生时的旧事,不知不觉到了他们从童年起就顶尊敬先生的那简陋萧条的住处,听他激昂地叙述毅然离开那执教三十多年的故乡只身入川到大后方来的缘由:“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点儿操守。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留在家乡了。”所谓“他们”,指的便是家乡那班“诗礼之家”的人物,临到考验,骨头酥软——他不能与之伍;同时,日本人卵翼下的政府又送来聘书,诱惑中混合着威胁,因而,“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面前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听罢一席大义凛然的话,

学生们从心底感到有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骄傲”!生于那样的年代,有这种感觉的,又岂止是这几位学生?这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3月,此后四年,未见有小说问世。1944年5月,也许是环境与心境得到相对的稳定,也许是“义民”的形象又集中地浮现在他心间,偏不写出便不免于负疚,竟一连完成了三篇:《邻舍吴老先生》、《辞职》、《春联儿》,形成他四川八年唯一的小说创作高潮。

“邻舍吴老先生”,是从内地避寇到成都来的,他心心念念的是故乡光复。若一听到故乡光复的消息,他会马上提手提皮箱打道回府的。但来自家乡的信息,却彻底打消了他回乡的决心。他“决意做迁川的一世祖了”!因为日本人评定他故乡的士绅为“最出色的中国人”,因此他“不好意思再说我是某地方人”从此他努力改变生活习惯,尽量适应四川风习,“正月初七游草堂寺,春二月青羊官赶花会,四月初八望江楼看放生,有什么应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甚至买来十来年后才能结果的橘树让儿子种在院内,一面怀想着故乡那红毛白沙甜胜冰糖的枇杷,一面决心在这橘乡里生根发芽。故乡是引人眷恋的,但倘若“其俗柔靡,人轻节义”,也就只好与之一刀两断了。实际上,要做迁川第一世祖的想法,最初属于叶圣陶自己;此后他逐渐发现不少从苏州到成都来的吴民,都开始憎恶故乡的柔靡之俗、节义之轻,这便扩而大之,成为许许多多从沦陷区避寇出来的节义之士的共识。自然,对于尚

未具有这种明确认识的流寓之士,“吴老先生”当然是一个榜样,一个学习的模范。

对于敌寇,国人需讲究气节操守,而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坚持抗战的人们,才是中国真正的“脊梁”。《辞职》中的青年会计员刘博生,原有可靠的职业和勤勉的精神,也甚为上司看重,但上司要他帮助侵吞八十万公款并分他四分之一作为诱饵时,他凛然辞职了。他说:“我不帮他拿,自有人帮他拿。不过我总算对他表示了抗议,虽然没有有什么实际效果,至少叫他感到一丝一毫的不痛快。就是这一丝一毫的不痛快,不能说对他绝无影响。同时,我也代表了许许多多的人警告了他。他不要以为有麻雀子的地方尽是与他一一路的货色,要知道比较正派的人到底还有,例如我。”

在战乱的背景下,以精妙的白描传神地勾勒出的小说人物,既非勇将策士,更非达官显宦,却都站在自己平凡的生活岗位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圣战中的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情节单纯,人物平凡,而气节操守令人肃然起敬。生为大波大澜的年代,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不同,驰骋沙场或力有不逮,同流合污则情所不容,于是,他们纷纷寻找保持清白气节的方式,在精神上支撑着日趋艰难的民族神圣抗争,虽不算轰轰烈烈,但也可歌可敬。其中鲜明地渗透着叶圣陶的爱憎,也清晰地表现出叶圣陶人格的投影。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风过留痕】

□简默

看过青海湖,我是带着失望上路的。接下来在返回西宁途中,我们将去丹噶尔古城。

起初,我凭字面以为此“古城”是真正的古城,它矗立在没有人烟的荒原上,残垣断壁是岁月和往事的遗骸,无声地抗拒着风沙和雨雪。但同行的导游说,此“古城”是约十年前在老古城的基础上重建的。失望似浓雾再次自我心头弥漫升起。也大约是从十年前开始,一些地方纷纷抢着拆了古建筑建仿古建筑,再挖空心思想地修新如旧,规模宏大地“造”出了一座座“古城”,却从里往外空洞得没有历史、文化和灵魂,只有盲目的双脚驮着简单的头脑,尾随在人流中疲惫地东奔西跑。

我在困乏和忐忑中担心着此“古城”也如是。

车到丹噶尔古城。我们被地接导游和她手中的三角旗牵引,沿着城中的街道边走边看,两边商铺林立,幌子招展,不知不觉地来到文庙。进入庙内,另有名堂,一个老者给每人发了本《论语》,说要领着大伙诵读。我转身出门,将诵读声撇在身后,端着相机信步闲逛,突然,我在左边走廊的墙上发现钉着一块木牌,上书“昌耀诗歌馆”,一个箭头指示着方向。我穿过圆形拱门,走过逼仄的走廊,进入一个院落,正前方黑色基座上屹立着诗人昌耀的正面半身塑像,只见诗人面容年轻、儒雅、端庄,戴一副眼镜,胸佩一条白围巾,像许多“五四”青年那样缠绕过脖子垂到胸

诗人中的野牦牛

他以强悍、粗犷、桀骜、敏感、特立、坚忍之态度和力量,从容面对跌宕潦倒的命运,像极了青藏高原上一头野牦牛。

前,仿佛一条绶带,诗人的胸前另系着数条哈达。

我是真的想不到会在这儿邂逅诗人和他的诗歌馆。昌耀是我心目中的大师,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曾经为我高扬起了诗歌的图腾。二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诗,初次读到昌耀的诗,他对人生底蕴的深刻理解,他电闪雷鸣过我的心灵,叫我目瞪口呆。这时恰逢一个“饿死诗人”的诗歌困顿时代,即使是“诗人中的诗人”昌耀也不例外。他生活窘迫,经济拮据,为此早已戒掉了曾如影随形的烟瘾,但他对诗歌依旧保有赤子般的纯粹与虔诚,就像藏区漫漫风雪中佛路上一路磕长头的信徒,他一直恪守着将两首诗的灵感 and 素材压缩成一首来写的习惯,不肯挥霍自己的感情和才气赚取廉价的稿费。在1993年第十期《诗刊》上,昌耀撰写了短文《诗人们只有自己能来救自己》,他为了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命运之书》,不得不采取此方式替自己预告和征订,因此该文也是一则征订启事。事后昌耀说:“这既可以说是一本书的自叙,也是精神的自叙——不媚俗,不告饶。”看过该文我当即响应,汇款预订《命运之书》。近一年后的九月十九日,我收到了诗人自青海省文联寄来的《命运之书》,一尊少女拉大提琴的花岗岩雕塑占据着大红封面的大半,仿佛契合着诗人字字啼血地抒写命运

的不屈精神,诗人在扉页间写道:“王忠先生正,昌耀签售,94.9.11”,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后头钤着他的名章。该书收录了昌耀从1955年至1993年近四十年创作的诗作,它们见证了他踉跄走过的困顿岁月,也见证了他执著追求精神高地的拳拳之心,更见证了一颗将诗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伟大灵魂的命运交响。我一首一首地读着,这些诗用最小的字号印刷出来,它们互相牵手紧随,依偎取暖,一气呵成到底,不像是“诗人中的诗人”昌耀也不例。他生活窘迫,经济拮据,为此早已戒掉了曾如影随形的烟瘾,但他对诗歌依旧保有赤子般的纯粹与虔诚,就像藏区漫漫风雪中佛路上一路磕长头的信徒,他一直恪守着将两首诗的灵感 and 素材压缩成一首来写的习惯,不肯挥霍自己的感情和才气赚取廉价的稿费。在1993年第十期《诗刊》上,昌耀撰写了短文《诗人们只有自己能来救自己》,他为了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命运之书》,不得不采取此方式替自己预告和征订,因此该文也是一则征订启事。事后昌耀说:“这既可以说是一本书的自叙,也是精神的自叙——不媚俗,不告饶。”看过该文我当即响应,汇款预订《命运之书》。近一年后的九月十九日,我收到了诗人自青海省文联寄来的《命运之书》,一尊少女拉大提琴的花岗岩雕塑占据着大红封面的大半,仿佛契合着诗人字字啼血地抒写命运

的不屈精神,诗人在扉页间写道:“王忠先生正,昌耀签售,94.9.11”,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后头钤着他的名章。该书收录了昌耀从1955年至1993年近四十年创作的诗作,它们见证了他踉跄走过的困顿岁月,也见证了他执著追求精神高地的拳拳之心,更见证了一颗将诗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伟大灵魂的命运交响。我一首一首地读着,这些诗用最小的字号印刷出来,它们互相牵手紧随,依偎取暖,一气呵成到底,不像是“诗人中的诗人”昌耀也不例外。他生活窘迫,经济拮据,为此早已戒掉了曾如影随形的烟瘾,但他对诗歌依旧保有赤子般的纯粹与虔诚,就像藏区漫漫风雪中佛路上一路磕长头的信徒,他一直恪守着将两首诗的灵感 and 素材压缩成一首来写的习惯,不肯挥霍自己的感情和才气赚取廉价的稿费。在1993年第十期《诗刊》上,昌耀撰写了短文《诗人们只有自己能来救自己》,他为了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命运之书》,不得不采取此方式替自己预告和征订,因此该文也是一则征订启事。事后昌耀说:“这既可以说是一本书的自叙,也是精神的自叙——不媚俗,不告饶。”看过该文我当即响应,汇款预订《命运之书》。近一年后的九月十九日,我收到了诗人自青海省文联寄来的《命运之书》,一尊少女拉大提琴的花岗岩雕塑占据着大红封面的大半,仿佛契合着诗人字字啼血地抒写命运

的不屈精神,诗人在扉页间写道:“王忠先生正,昌耀签售,94.9.11”,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后头钤着他的名章。该书收录了昌耀从1955年至1993年近四十年创作的诗作,它们见证了他踉跄走过的困顿岁月,也见证了他执著追求精神高地的拳拳之心,更见证了一颗将诗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伟大灵魂的命运交响。我一首一首地读着,这些诗用最小的字号印刷出来,它们互相牵手紧随,依偎取暖,一气呵成到底,不像是“诗人中的诗人”昌耀也不例外。他生活窘迫,经济拮据,为此早已戒掉了曾如影随形的烟瘾,但他对诗歌依旧保有赤子般的纯粹与虔诚,就像藏区漫漫风雪中佛路上一路磕长头的信徒,他一直恪守着将两首诗的灵感 and 素材压缩成一首来写的习惯,不肯挥霍自己的感情和才气赚取廉价的稿费。在1993年第十期《诗刊》上,昌耀撰写了短文《诗人们只有自己能来救自己》,他为了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命运之书》,不得不采取此方式替自己预告和征订,因此该文也是一则征订启事。事后昌耀说:“这既可以说是一本书的自叙,也是精神的自叙——不媚俗,不告饶。”看过该文我当即响应,汇款预订《命运之书》。近一年后的九月十九日,我收到了诗人自青海省文联寄来的《命运之书》,一尊少女拉大提琴的花岗岩雕塑占据着大红封面的大半,仿佛契合着诗人字字啼血地抒写命运

昌耀在我们这些人中是神一样的存在。我的一位在四川基层法院工作的朋友,为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给昌耀写信请他题词,大概他在信中说了不少仰慕的话,昌耀回信的大意是:高处不胜寒,置我于平地即可。

来到丹噶尔古城我才知道,古城所在地湟源县就是昌耀的第二故乡,这儿的日月乡是他最初的“边关流寓”之地,也是他成为一户藏族之家的义子和“赘婿”的再生之地。他曾写下了《慈航》、《哈拉库图》、《丹噶尔》等与这片土地命运维系的诗作,并最终成为“中国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

这位一生洞悉“信仰,是一种恒大的美”的诗人,自十四岁投笔从戎,十七岁在朝鲜战场负重伤离开火线,十九岁报名来到青海,二十一岁被打成“右派”,四十三岁彻底摘除“右派”帽子,至新千年三月的一个早晨,罹患肺癌的他不忍疼痛,毅然从窗口奋力一跳,扑向冉冉升起的太阳……

他在诗中写道:“沿着河边/无声的栅栏——/九九头牦牛以精确的等距/缓步横贯茸茸的山阜/如同一列游走的/煨堡。”《慈航》他以强悍、粗犷、桀骜、敏感、特立、坚忍之态度和力量,从容面对跌宕潦倒的命运,像极了青藏高原上一头野牦牛。

九九头牦牛外,第一百头是野牦牛,他的名字叫昌耀。

(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

砚,是书家的爱物。米芾因一方紫金砚,留下了传之千古的《紫金研帖》。帖中说:“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哉。”

米芾是对的。砚,怎么能当陪葬品呢?难道你苏大学生在地下还要练书法吗?

因一方砚,苏、米两位大书法家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一代一代传到今天……

我在偏僻的乡间,出家门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从小看到的就是黄土地或者是黄土地上长满的绿油油的庄稼,不可能像苏东坡那样,小时候就从家中闲地上拾得一块有闪闪银“星”的淡绿色的“天砚”。不过,我家倒有一方砚。这方砚是一块很大的四方方的黑色石

【艺术漫谈】

古砚

□常跃强

头,中间有一个大而深的圆形的砚池,盖子也大,上面的钮是雕刻的一条盘着的龙。更让人感到方便的是,有一个角上被凿了一个洞,研好的墨汁可以通过这个小洞口倒进墨盒里去,用起来十分方便。那时候我家不把这方砚叫砚台,砚海啥的,而是叫它砚壶。

我小时候就爱好书法,在家练字,没少在这个砚壶里研墨。那时在家里的一个八仙桌上练,练了几年,先是能够悬腕,再后来竟然能够悬肘。那时候我就喜欢草字,常常悬肘涂鸦,很是得意。直到现在,我写条幅题款写尺牍,胳膊肘儿从来不用贴桌面。

人说,10年成就一个画家,30年成就一个书法家。魏启后先生亲口对我说:艺术这个东西不能早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我老家的农民说得好:你不能硬掰葛藤。记得林敏之先生说郑板桥就是硬掰葛藤,形成了他那种“乱石铺街”体。然而,当时的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经济十分繁荣,许多盐商巨贾也都聚集在这里,他们附庸风雅,又多好奇异,郑板桥的竹子画得好,字又怪异,正迎合了那些盐商巨贾的好奇心理,于是一拍即合,最后形成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都知道有个郑板桥。

时代成全了他。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得了一方红丝砚。后来,我去天津看望孙犁先生,把这方红丝砚送给了他。当时他一楞,他说:这东西可真贵!我说:送给您老,什么贵不贵的,不过是我的一点心意罢了!后来,孙犁先生曾在他的书中专门提到过这件事:“山东常君,数年前,赠一方红丝砚,甚美观。今查纪氏砚谱,亦谈及红丝砚,然谓青州红丝砚,早已绝迹,纪氏当时求之,已甚难得。不知何以近日又有出产,方便时向山东朋友询问。”(《曲终集》222页)

四年前,英雄山下的文化市场初具规模,还不像现在这么火爆。在那里我发现了一方旧砚,长方形,淡绿色,砚底部还刻了一个人的名字。卖砚的不是本地人,他们在文化市场的一个角落里租了一间房子,主要是卖石狮子。我跟那位卖砚的老大婆讲价钱,一开始,她要五百,我说不值,就跟她继续讲价钱,从500元到200元,再到150元,最后讲到了120元。尽管我生活拮据,但这些钱我还是能拿出来的,然仍觉得贵了一些。可是再跟那老大婆讲价,她是一分钱也不让了。于是悻悻然,我只能回家去。

这一方砚让我牵肠挂肚一直放不下。一日天降大雨,我想机会来了,骑着自行车就去了文化市场。刚下过雨,文化市场里面到处湿漉漉的,没有人来买东西,静悄悄地听不见声音。我又去找那位老大婆,我说我要再看看那方砚,那老大婆很热情,就又拿出来让我看,我接过砚后就继续跟她讲价钱。先是从120元降到了100元,我还是觉得有点儿贵,就继续做她的工作。我说天阴下雨没买卖,这房费和水电费你可是一分钱也不能少交呀!我这番话触动了她,她又降了10元,我说:南方说8就是发,干脆80元算了!她不愿意,我望了望天,说:这是阴天落地的,再不会有人来了!行不行?行就行,不行我可要走了!

说着,我就推自行车要走。我走出去没几步,她就把我喊住了……

80块钱买下一方砚,我心里一点儿也没有占便宜的感觉,因为讨价还价是天经地义的事。

回到家,我把砚台清洗了一下,然后把背面的人名输入电脑,搜索了一下,原来这个人还是个南方的进士,做过地方官。我以为得了宝贝呢,于是去英雄山下去找搞篆刻的老何,请他帮我鉴定一下。老何一看就说这是一方古端砚,我说后边还有名字,我在电脑上查到了。老何笑笑,抓了一把他刻章残留的白粉末,涂在字上,端详了半天,说这些都是假的。我还要说什么,老何不容置疑地说:你就当一方古端砚用就是了……

尽管人名不是真的,我觉得也买值了。因为它不仅是一方古端砚,并且很好用,就不不得了!

每当我读书读累了,在电脑上敲文章敲累了,我就研墨展纸,挥洒一番,心情就变得格外舒畅。用文徵明的诗来形容,那就是:端溪古砚紫琉璃,斑竹新装赤兔毫。长日南窗无客至,乌丝小茧写离骚。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